

余姚市档案馆编
余姚市政协教科文卫体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余姚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余姚史话

诸焕灿 著

文献名邦

东南最名邑

姚江人物甲天下

余姚史话

诸焕灿 著



定价：98.00元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余姚史话 / 诸焕灿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2.12
ISBN 978-7-5115-7633-0

I. ①余… II. ①诸… III. ①余姚—概况 IV.
①K92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238879号

书 名: 余姚史话
YUYAO SHIHUA

著 者: 诸焕灿

出版人: 刘华新
责任编辑: 林 薇 陈 佳
封面设计: 余姚博尚印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3486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古新彩印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科宇律师事务所 010-83622312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6.25
版 次: 2022年12月第1版 202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7633-0
定 价: 98.00元

余姚史话

编辑指导委员会

名誉主任: 朱卫东

主 任: 周 斌 徐 然

副 主 任: 邵姚斌 李基坚 史红科 邵亚辉 楼洁芳

陈伟根

委 员: 陈海玲 陈 彦 方麒君 朱 姣 沈 卓

刘 薇 朱杰炳 缪 苗 徐冰青

让家乡人知家乡事

《余姚史话》是一本家乡人写家乡事，能让家乡人知家乡事的地方史研究著作。主要著者诸焕灿先生，乃阳明故里人，曾任余姚市档案史料研究会会长、姚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平生唯好读书，崇敬阳明学说，眷恋乡土，笔耕不辍，让《余姚史话》充满了家乡人的亲切解读。

从历史学体系考察，地方史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不同的界定，共同点是学术要素齐备规范；按历史学家包伟民教授的观点，“地方史”是各级地方政府推动的、基于行政区划展开的关于本地区历史的编纂工作，其书写的基本路径一般按全国通史框架来展开，在大通史的框架里填进地方性资料，使之成了通史的地方版本，致使有学者评价这些史志为“一场既有思考和写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戏”，或者“国家背景下的地方事件”。然《余姚史话》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框架，于史料汇集与规范论文之间，找到一种轻松又不失严谨的表达。

余姚以文闻名于世，一是7000年前河姆渡的史前文化，二是以“四先贤”为代表的“姚江文化”，三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红色文化。900多年前，范仲淹诗赠后辈谢景初百里宰于余姚，“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诗文皇皇，道尽余姚文化风采。自科举以来，余姚共出过5名状元、635名进士，东南名邑、文献名邦，人杰地灵、钟灵毓秀，当得“姚江人物甲天下”之称。

《余姚史话》全书，合集分为“人文渊源、行政建制、城署营建、历代兵燹、书院学校、姚江科举、文史技艺、山水风雨、民俗风情”九个篇章。自“余姚”由来县制设置始，凡涉行政、城建、军事、教育、科技、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数十篇文章，写城郭衙门、山水名胜、文化古迹、名族大户、黎民百姓、市井生活，文从字顺，笔酣墨饱。其中，有著

文考证余姚重要文化脉络，如考证余姚之名“山川说”由来，考证虞舜故里，考证县置历史沿革，考证乡村名称由来，考证县衙设置，考证学官设置，考证余姚唱腔等；有写“姚”名标志文章，如姚城牌坊、姚江驿、姚城祠堂、姚江科举、姚江书院、姚江中学、姚北海塘、姚江古代科技、姚江岁时节令风俗等；有述历代兵燹，如吴越之争、隋唐战事、董昌反叛、康王避兵等；有述抗外事迹，如明代抗倭、清代抗英、民国抗日等诸事；有述余姚所涉起义革命之事，如孙恩起义、方腊起义、抗清余姚首义、十八局佃农起义、太平军转战余姚，以及浙东抗日根据地事实；有写庠序之教，罗列学官、书院、社学、私塾教育，历述姚江书院、五桂楼、汝湖农校、姚江中学、余姚第一中学之变迁等；有述余姚文化风俗，如余姚方志编纂、续兰亭会、余姚古代科技、余姚唱腔、余姚滩簧、余姚风俗、余姚过年、余姚话、余姚庙会等，尤其是对于余姚文脉做了很好的描述。

从本质上看，不论是生物学上的个人还是社会学上的群体，或者是区域城市，其生命的基本特征就是遗忘，幸赖文化有保存记忆的功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曾把文化解释为“把短暂的东西转化为永久的东西”。每个地方文化都会创造一些方式防止无情的和普遍的持续的遗忘，保证个人与社会身份的有效传递和持续保存，从这个意义上看，《余姚史话》是用文化法则让记忆得以留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切实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记录好、留存好。余姚市档案馆秉承总书记指示精神，依托馆藏资源，围绕存史资政育人总目标，通过征集、编研、展览这“三驾马车”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既加强了档案文化建设力度，又使档案资源效用得到了最大化发挥。一是拓宽档案征集渠道，加强档案保护力度。围绕地区“特点”，围绕时代“重点”，系统征集有地区“特色”的档案资料，做好本地区重大活动、重大事件、杰出人物档案的征集接收工作。二是挖掘地域特色文化，打响档案编研品牌。打破囿于馆藏的界限，凝聚部门、专家学者、社会等多方联动合力，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档案编研成果，向社会公众呈现出更丰富的、与余姚历史文化有关的原始档案和珍贵史料。三是着力打

造精品展陈，强化档案教育功能。自余姚市档案馆新馆落成使用以来，共打造出三个各具特色的展厅，尤其是“知行余姚”档案文献展，将余姚大地自古至今激越跳动的脉搏栩栩展现在大众眼前。“美在档案馆、文在档案馆、学在档案馆”的独特品牌日益凸显。这次编辑出版《余姚史话》，并不追求宏大叙事手法，事无分巨细，以史实为依据，叙述兼具趣味性、科普性与故事性，以补地方存史之急、修志之实、资治之需、深研之途、文化之道，其功备焉。

识此，是为序。

傅荣校

2023年5月3日

傅荣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学名师，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学术部主任兼基础理论委员会主任，余姚市档案史料研究会顾问

目 录

序：让家乡人知家乡事 / 001

人文渊源

余姚取名之由来 / 002
谈古说今话余姚 / 004
河姆渡史前文化 / 010
虞舜故里 / 019
两宋时期的余姚 / 024
“文献名邦”题匾因由 / 037
余姚历代人口 / 039

行政建制

秦始皇与余姚建县 / 044
历史沿革 / 046
历代行政区划 / 057
民国十九年余姚县区镇乡村 / 059
1949年后余姚行政区划变易 / 066
城区街弄 / 077
街道乡镇取名由来 / 096

城署营造

双城烟雨话变迁 / 110
余姚衙门说古今 / 113
汤和筑临山卫城 / 118

余姚学宫 / 120
通济桥与舜江楼 / 131
姚城牌坊知见录 / 134
姚江驿 / 145
姚城祠堂 / 149
姚北海塘 / 162
文化遗产 / 165

历代兵燹

车厩山巅思越王 / 180
孙恩起义与余姚 / 183
隋唐时期的余姚战事 / 186
顾全武攻伐董昌 / 191
方腊起义经余姚 / 193
康王避兵过余姚 / 194
抗倭斗争在余姚 / 196
抗清斗争与余姚首义 / 203
胜山港俘获英军 / 210
十八局佃农起义 / 214
太平军转战余姚 / 227
辛亥革命与余姚光复 / 234

书院学校

庠序之教遍余姚 / 238
姚江书院史话 / 244
黄澄量与五桂楼 / 250
汝湖农校 / 255
姚江中学的抗战洗礼 / 257
余姚第一中学 / 260

姚江科举

余姚试院与秀才考试 / 264

姚江科举三鼎甲 / 270
科举征辟和魁首名录 / 276

文史技艺

方志编纂略述 / 280
参修校印史志 / 287
秘图山前的续兰亭会 / 294
四明山游历与撰述 / 299
姚江古代科技 / 303
古典声腔“余姚腔” / 312
余姚滩簧 / 318

山水风雨

龙凤龟蛇拱护姚城 / 324
中天气爽龙泉山 / 329
血雨腥风祭忠台 / 341
二王祠追踪 / 345
阳明先生讲学处中天阁 / 348
姚城旧水系 / 351
四明山和姚江 / 355
四明山虎踪漫议 / 358

民俗风情

姚江岁时节令风俗 / 368
余姚过年杂说 / 378
余姚话特色 / 385
余姚惰民浅考 / 390
余姚庙会 / 396
《余姚史话》参考文献 / 405

后记 / 407

余姚取名之由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一统的民族共同体，幅员广大，人口繁多。为了区别和行政治理的需要，每一地方依据各自山川环境形势，划分、确立该地方的领域面积和境界。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帝誉创制九州，统领万国；尧遭洪水，天下分割为十二州，使禹平治水土，更制九州，列五服；禹继唐虞之盛，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400年间递相兼并，逮商受命仅存3000余国，亦分为九州，分统天下。及周武王克商纣王，尚有1800余国，而分天下为九畿。厥后诸侯互相并吞列国，耗尽陵夷，至于战国时期，秦、魏、韩、赵、楚、燕、齐七雄并存；秦始皇并吞六国，罢诸侯而置郡守，分天下为36郡；汉承秦制，攘胡开越，四履弥广，以州统郡，郡统县，全国一统于中央，已成定局。中间各朝虽有变易，基本格局相沿不变。一统之尊，民物阜康，县各有称，人文宣朗。

每一境界和领地必须有一个地名。对于郡县的取名，古人一般有4种说法：一为山川说，二为人名说，三为瑞应说，四为物产说。对余姚来说，瑞应说和物产说并无关系。余姚历来是盛产海盐之地，故在古方志书《越绝书》上把“余”字解作“盐”字，但经细考，取名时并未将此作为依据。至于人名说，有人认为余姚是“舜支庶所封之地，舜姓姚，故曰余姚”（舜生于姚江边的姚邱山，故姓姚）。此说曾沿说久远，至《大明一统志》仍沿旧说：“余姚县在府城东一百八十里，舜后支庶所封，以舜姓姚，故名。秦为县，属会稽郡，汉晋以后皆因之。”因此，至今仍有人信从此说，但此说法早在汉代时就被大学者应劭所排除，认为“无取古人君为县名之理”。况且余姚得名在先，姚舜出生在后，那么，剩下的即是“山川说”了。

经查古文献资料，余姚之取名应属“山川说”较为可靠。较早的地理书籍《山海经·南山经》“句馀山”条下载：“又东四百里曰句馀

（“句”字读gōu。唐代之后改称为四明山）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晋代大学问家郭璞在此条下作注说：“今在会稽馀姚县南，句章县北，故此二县因此为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说：“江水又东经馀姚县故城南，县城为吴将朱然所筑，南临江津，北背巨海……秦始皇南游会稽，途出是地……因其句馀山以名县。山在馀姚之南，句章之北也。”至于“姚”字，今已失传的古籍《五帝系》一书中就有记载。汉代应劭曾读到此书，说：“姚水见《五帝系》，固不始于夏之无馀矣。”姚水边有姚邱，《太平寰宇记》一书中曾说道：“舜生于姚邱。”姚邱又因在姚水之旁而得名，说明在舜出生之前已有姚邱之地名，故此宋代写的《元丰九域志》中也说：“馀姚有姚邱山。”由此可知，馀姚之名即截取了句馀山之“馀”字，姚水之“姚”字，合称为“馀姚”。新中国成立后改用简体字，把“馀姚”改写为“余姚”，沿用至今。

由此可知“余姚”名称之古老，它在秦始皇始建余姚县之前即已存在。

谈古说今话余姚

余姚地处浙东宁绍平原，南列崇岭高峻之四明山，北临溟海横载之钱塘湾；东接蛟门，西通曹娥。中有姚江，发源于四明山中的大岚山，北泻转东，穿越余姚南北双城之间，奔腾入海。龙泉山雄峙余姚城内，姚城四周，北有凤山、客星，东有凤山，东南有龟山、蛇山，西南有黄山，参卫拱翼，秀表经纬。这里襟海带江，土地膏腴；山川佳美，人杰地灵，历来为浙东重镇，东南都会。秦汉以降，名人迭出，精英联袂，故有“东南最名邑”“文献名邦”“姚江人物甲天下”之佳誉。

余姚历史文化根基极为深厚，它包含着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以王阳明等四先贤为代表的姚江文化、以四明山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战地文化。自从河姆渡先民创造史前古文明，相沿至今，众多的文物遗存、代代相传的文化精英浓缩了7000多年的历史，凝聚了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建筑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科学文化、印刷文化、农业文化、医药文化、天文律算等，在任何历史阶段都站在一定的高度，为世人所注目。尤其是名人文化，众多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军事家，筑起了“姚江人物甲天下”的丰碑。这里有王阳明故居瑞云楼、黄宗羲墓、明代状元宰相谢迁的状元楼等人文景观1300余处。

其中，余姚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河姆渡遗址（1982年2月）、鲙山遗址（2013年5月）、田螺山遗址（2013年5月）、王守仁故居（2006年5月）、黄宗羲墓（2006年5月）、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2006年5月，共7处）、浙东运河上虞—余姚段（2013年5月）、余姚通济桥（2019年10月）。

余姚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舜江楼、大隐石宕遗址（含山王

庙）、五桂楼、孙子秀墓、白云桥、马渚横河水利航运设施（包括斗门闸）、阳明先生讲学处、胡公岩摩崖石刻、泗门谢氏始祖祠堂、成之庄、姚江水利航运设施及相关遗产群（浦口闸丈亭老街）。

余姚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98处，文物保护点101处。1991年10月，余姚被列为浙江省级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余姚历史，往上追溯至新石器时代，7000年前的河姆渡先民创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文明奇迹，先进的稻作文化、精巧的木结构建筑、瑰丽的古陶、神奇的原始雕塑艺术，蕴含着姚江先民的非凡智慧和开拓精神。

先秦时期，姚江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交流，终于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入浙，分立浙东县境，始置余姚县。东汉建安五年（200），由余姚长朱然开始构筑城池。自此之后，王朝历代更替，余姚县屹立东南，以其神奇的生命力，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艰难跋涉，创造了辉煌的姚江文化，经历了2200余年的风霜岁月。

余姚境内有四明山，自汉唐以来，由于统治阶层崇尚道教，众多道教代表人物隐居于此炼丹修身，成为著名的道家圣地，被冠以“丹山赤水洞天”之佳称；另有梨洲、茭湖、大隐三福地。历代名人学士、墨客仙家，纷纷来此周览，或探奇历险，或赋诗撰文，或筑室隐居，使四明山成为一座饱含人文雅气、佛道仙气的人间圣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遗迹。东汉六朝时期的梅福曾在山中筑石屋书库，丹丘子赐虞洪瀑布仙茗，刘纲夫妇弃官学道，刘晨、阮肇巧遇仙女等佳话，均给后人留下了广泛的影响。此后更有谢安、李白、孟浩然、皮日休、谢遗尘、陆龟蒙等文人骚客，用巨笔写下了大量赞赏四明山的诗篇。古人的举动，促动我们踏着古人的足迹，领略名山奇景的胜貌，去体验历史的人文氛围，融身于天地之间，修一颗从容心。

精英人物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他们的高尚品格和渊博学术，是后人的

高标。汉代高士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客星犯帝座”的佳话，影响中国历史2000余年，为历代文人所仰视，可使贫夫廉、懦夫立，令人不由得赞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自东汉末年起，官学衰微，世家大族日益强盛，私学随之逐渐发达，虞氏文化世家成为姚江流域学术文化的主要代表。家学渊源，世代相传，造就了“经学大师”虞翻。东晋时期，虞喜擅天文律算，并发现了“岁差”；虞预长于历史学、方志学。唐代虞世南在文学、书法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显宦数不胜数。

五代时期，上林湖越窑青瓷“秘色瓷”，滋润透明，如冰似玉，成为王朝贡品。宋室南渡，浙江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众多的赵氏皇族子弟及官宦世族纷纷卜居姚江，有力地促进了姚江流域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姚江流域的文教事业进步很快，士子读书风气浓厚，中举人数急剧上升，形成了良好的人文环境。较著名的有胡宗伋、孙应时等的理学，高翥的诗学，高似孙的史学、方志学。南宋绍兴二年（1132），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由绍兴府余姚县镂版印刷，说明余姚造纸、印刷、校刊技术之先进。

元代，在姚城内秘图山前，继承东晋会稽的兰亭会而举行的“续兰亭会”，是文人相聚的又一次盛会，给当时的诗歌创作传递了一种可喜的信息。

进入明代，姚江人士在文化上的贡献尤为突出。古文字音韵学家赵搨谦声誉高标海南；贤相谢迁立朝侃侃；心学大师王阳明，在治军、理政、讲学中度过一生，针对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的要害，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命题，以人的本心、自然欲求和固有的“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猛烈地冲击了程朱理学。王阳明追求意识独立、个性解放，有着近代民主启蒙的积极作用，得到知识界的广泛响应，形成一股新的哲学思潮，成为影响深远的“阳明学派”。他的“致良知”，使人摆脱世俗的束

缚，自由自在地生活，可以如翱翔于万里长空的飞鸟和跳跃于宽阔海洋的游鱼那样自由。王阳明是一位500年前的伟人，是中国近500年来思想变革的先驱。

吕天成的戏曲论著《曲品》，是明代论曲的玉璧。叶宪祖等戏曲作家，更有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余姚腔”，大大激活了明代的艺坛，成为千古绝唱。有明人物甲天下，300年人文之盛，名世佐业，巍科高爵，绳武不替。

明末清初，有民本主义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对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及其腐朽的思想体系做了无情剖析与深刻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政治见解；《明夷待访录》一书更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一反对君主专制的振聋发聩的呼喊，引起全社会的大震荡；黄梨洲是一位立足于当时的现实，而又一脚跨进了未来的伟大思想家，留下的著作内容广泛，是一位至死不渝的著述大师，展现了博学多才的大学问家的风采。

在这一时期，还有朱舜水，一位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先驱。他先后7次东渡日本，为抗清斗争积极奔波。当他看到清政权日益巩固，复明无望，因不愿做清朝的顺民，遂寓居日本20多年，讲学以终。

在明末至清中期，在余姚还存有一个传播“阳明学说”的大本营——姚江书院，创立于崇祯十二年，沈国模与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为姚江书院初创时期四先生；姚江书院坚持道德至上论，坚持了与清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更主张躬行实践，把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推行到一切言行之中。后又有邵廷采，一生从事教育与经史之学，其学既得姚江书院的嫡传，又继浙东学派的血脉，堪称浙东学派的健将。邵廷采的从孙邵晋涵，是清代一位杰出的史学大家，浙东学派的第四代传人。他参与《四库全书》的编撰，《四库全书·史部》的《提要》即出自他手。他在金石学、音韵学、方志学上均有着较高的造诣，曾被章学诚称为“浙东学术的

殿军”。

自宋至明清，余姚一地先后出过635名进士，其中有5人是一甲第一名称状元：宋庆元二年（1196）的余姚城里人莫子纯，宋景定三年（1262）的余姚梁弄人方山京，明成化十一年（1475）的余姚泗门人谢迁，成化十七年（1481）的余姚城里人王华，明嘉靖十四年（1535）的余姚菁江渡人韩应龙。尤其是嘉靖十四年乙未科，全国共录取进士325名，余姚县考取17人，占全国的5.2%。17人中头名状元、第二名榜眼（孙陞）同为余姚人所得，一时名扬天下。余姚人经过殿试获得一甲第二名榜眼的共有5人：明代的黄珣、孙陞、毛惇元，清代的诸重光、邵瑛。获得一甲第三名探花的共有4人：明代的谢丕、胡正蒙，清代的卢文韶、朱兰。全国会试时获得第一名会魁的共13人。余姚人获得第一名解元的共21人。省试中获得经魁的共62人。武科考试，明代孙堪、清代谢文2人获得武会元；清代孙琮夏获得武状元。获得武解元的，明代有4人，清代有4人，共8人。

自汉代严子陵始至清代，共达187人被朝廷特征，其中仅明代就多达108人次，其中有赵谦和岑琬两人被特征两次。有谢迁、吕本、孙如游3人官至大学士（阁老）。

姚江流域历来有藏书、教子读书的好风气，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有“浙东第二藏书楼”之称的五桂楼，由黄澄量创建于清嘉庆十二年，藏书量达到6万余卷，至今尚高耸于四明山北麓的历史文化名镇梁弄镇内。

四明山作为浙东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鼓动全民抗日，掀起了四明山战地文化活动，兴办革命报纸，出版革命书刊。这一时期，武装斗争与文化相结合，使四明山的文化事业形成了一套适应根据地战争需要、充满战斗活力的新型文化机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教育活动家蒋梦麟，翻译家楼适夷，书画词学家叶恭绰，历史学家陈登原、黄云眉、王仲荦，社会学家严景耀，画家严子鸿、

叶鸿业、蒋君扬，戏曲教育家、著名导演朱端钧等。

余姚不愧为历代人文之渊藪，精英辈出，著述宏富，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真正的“文献名邦”。

河姆渡史前文化

蜚声中外的河姆渡遗址，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芦山寺村。1982年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上半年渡头村搬迁，原址上建造了河姆渡遗址陈列馆，开始接待前来参观的中外游客。1991年又破土动工，兴建起离地架空干栏式结构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

1973年6月，原罗江公社红星大队第十一生产队，在渡头村挖掘排灌站，当基础工程掘进至3米左右时，发现了大量的乌黑陶器碎片、鹿角和各种动物骨骸的混合堆积物。文物主管部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出了考古发掘工作队进行小规模试掘，结果表明地下原始文化堆积物十分丰富，是浙江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文物部门于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和1977年10月至1978年1月接连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这才初步揭开了河姆渡遗址的秘密。遗址面积达4万平方米，有4个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文化遗物十分丰富，保存完好。经专家评定，这里的文化遗址具有自身的特征，为其他文化遗址所无，就以遗址所在地“河姆渡”命名这一遗址文化，称之为“河姆渡史前文化”。

河姆渡地名之由来

按《史记》《汉书》载，秦末汉初，有东园公、绮里季、甬里先生、夏黄公，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皆白，隐居商山，世称“商山四皓”。高祖召，不应。后高祖欲废太子刘盈，立爱妃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计，迎四皓，使辅太子。一日内宴，四皓侍太子见高祖，高祖曰：“羽翼成矣。”遂辍废太子之议。后夏黄公避居浙东大隐山，死后安葬于此，墓近姚江渡口，就称此渡为夏墓渡或黄墓渡，后由墓名转而做了地名。按浙东土音“夏”与“河”接近，“墓”与“姆”同音，由此“夏墓渡”就

讹传成“河姆渡”。

文化层

考古学上的“文化”指物质文化，如人类创造的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艺术品、装饰品等。由历史上人为所抛弃的物质堆积物，称之为“文化堆积”。而由文化堆积所形成的地层，考古学上称之为“文化层”。河姆渡遗址即形成了上下相互叠压的4个文化层：

- 一、5200年—4700年前；
- 二、5800年—5500年前；
- 三、6300年—5900年前；
- 四、6900年—6570年前。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它纠正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唯一发祥地的错误论断，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生是多源头的，中国的史前历史是多中心的。它导致了对中国史前历史的重大修正，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同样是孕育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

关于海浸

中国东部沿海从第四纪晚期更新世以来，地貌更新，有95%以上与现在相似，这在地质年代上属最后一纪。从第四纪早期以来，曾发生过3次海浸。第一次为星轮虫海浸，发生于10万年以前，海退发生在7万年以前。第二次为假轮虫海浸，发生于4万年前，海退发生于25000年前。假轮虫海退是全球性的，规模极大，中国东部海岸线后退约600公里，今浙江海域的大陆架全部露出，东海外缘的贝壳堤位于大陆架前缘-155米，今宁绍平原与舟山群岛连成一片。海退之后，越族祖先就在此繁衍生息。第三次为卷转虫海浸，发生在15000年前，经六七千年海面的缓慢上升，至7000~6000年前，整个宁绍平原又沦为浅海，海岸线到达今会稽山和四明山麓线。在海浸的1000年中，自然环境迅速恶化，平原上的居民纷纷流散，河姆渡遗址可能就是南移过程中建立的一个聚落。当海浸达到高峰时，河姆渡遗址

也被淹入海底。越族先民被迫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流散的道路有三：越达杭州湾，向南进山，漂海向东转南。经过近千年海退之后，浙东平原裸露，海岸线回复现在的位置，四周先民又先后迁居浙东平原，有人到河姆渡区域定居，自此之后，创造了姚江流域的远古文明。

稻谷文化

在河姆渡遗址的丰富遗存中最有价值的是人工栽培稻的发现。在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稻谷，其数量之多及保存之完整为世界所少有。堆积物中的水稻遗物，有稻根、稻秆、稻叶、谷粒、壳皮。谷粒出土时颜色鲜黄，外形完好，壳上的稃毛清晰可辨，但瞬息之间即变为黑褐色。经专家将它与野生稻、现代稻进行比较研究，肯定其是人工栽培的籼稻（早稻）。加上出土物中的农具（骨耜、骨镰），古文献中关于野生稻的记载，近30年来在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出土的稻谷，更是有力的旁证。它说明河姆渡先民已懂得种植水稻，开始过着以农耕为主，以狩猎为辅的农猎生活。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用骨耜翻耕土地，稍加平整后即播种，或直接撒播，或挖洞点种，然后灌上浅水，使其发芽生长。成熟后用骨镰将稻秆、稻叶、稻穗一起收割。

河姆渡遗址的古稻谷证明了中国的人工栽培稻早于印度，推翻了中国的水稻是由印度传入的错误论断。更把人工栽培稻的时间向前推进了一大段，它比此前所认为的最古老的泰国稻谷还要早数百年，由此说明中国是世界上稻作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生物的进化是缓慢的，依据河姆渡遗址的古稻谷及其变异发展的历程，可推知追溯到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长江下游是我国人工栽培稻的起源地。

木结构建筑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对于选择居址是十分重视的。黄河流域的先民，往往选择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或两河交汇处的高地上掘洞居住。在长江流域的下游，先民们选择临近河流的高阜或近水的山丘坡地上定居。人们总把“有巢氏”推崇为发明“巢居”的始祖。所谓巢居，就是把房屋建在大

树上，人居其中，像鸟住巢。随着社会发展，居住在树上的人们逐渐向地面过渡。在长江下游地区，由于低湿，把房屋建造在潮湿的地面上是不足取的，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干栏式的房屋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房屋遗迹，便是一种干栏式建筑，它揭示了我国先民在7000年前的房屋建造技术。

河姆渡人居住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最长的达23米以上。房屋结构的大小，作为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河姆渡人，则要看这一氏族家庭中有多少成年姑娘而定。因为每当姑娘成年之后就要分配给她一间房屋，以便组织她的对偶家庭。

河姆渡人要建造木结构干栏式住宅，必须用石斧伐木，再将原木加工成桩、柱、梁、板等建筑构件。榫、卯、企口的发明及其在建筑上的应用是河姆渡先民的杰出贡献，是建筑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还有销钉的使用，尤其是企口板的拼接方法，紧密而不见通缝，它标志着河姆渡文化时期制作木结构已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是我国7000年前在木结构方面的又一突出成就。从建筑遗迹看，河姆渡人的住宅比较奇特，它的基础是约等距离先打下数排木桩，进深约7米，在其间架设纵横交错的地龙骨（地梁），然后在地龙骨之上铺设地板，地板长约1米，厚5~10厘米。这便形成了使居住面架空的住宅基座（底架）。而后再在基座上构筑屋架，紧接着便是敷椽、用席箔或茅草盖顶。每幢房子有7~8间，所以称之为“长屋”。由于气候湿热，长屋的四周围护可能比较简单，用树枝、木板和树皮等扎结而成，形成现代的栅栏。

家畜的驯养

家畜是由同类的野生动物驯化而来的。野生动物被驯服而受人类控制以后，还要经过漫长的驯化过程，去其野性，适应家养的环境，并不断地进行选种和配种才能使家畜繁殖起来。动物的驯养成功也是人类历史上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就。人类社会刚开始时，他们过着不稳定的游猎和采集生活。由于猎获野兽的增加，有时就有了剩余，人们便把幼小的兽崽暂时喂养起来。在长期的喂养过程中，人们发现有些动物性情比较温

驯，而且与人类亲近，人们在喂养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选种和配种，一年复一年，一代传一代，经过较长年代，家畜终于问世。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的数量和种类是惊人的，常见的有狗（狼）、猪（野猪）、羊、鹿、猴、龟、鳖等，还有少见的犀牛、象等。狗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之一，距今已有10000年的历史。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首先改变其凶残的本性，使之变得温驯，同时必须发展狼的机警、灵巧、敏锐的习性和善于奔跑、追逐的本领。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必须对已驯养的狗进行选择 and 配种，并进行长时期的训练。在河姆渡遗址居住区内发现有狗屎，这进一步证明河姆渡人已经养狗。狗是人们狩猎时的随从猎手，是守护庄稼的助手，是忠诚的卫士，又是饥荒时的“储备粮”。

野猪在我国有广泛的分布，这就有了驯养家猪的可能。中国家猪是亚洲野猪许多变种中的基本品种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的遗骸很多，从遗骸考察来看，猪牙磨蚀程度较浅，幼猪和成年壮猪占大多数，这说明这些猪很可能是人工养肥后宰杀食用的（野猪的前躯特大，占70%，而现代猪前躯较小，只占30%）。遗址出土一件小陶猪，体态肥胖，四肢较短，前后躯比例为1:1，介于野猪和现代猪之间，这无疑是河姆渡人养猪的一个重要证据。河姆渡遗址家猪遗骸的发现，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家猪。

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一只陶塑的小羊，根据体形判断，与家羊形态特征相似，说明河姆渡人还驯养家羊。

狩猎工具

狩猎工具的不断改进，是人们狩猎经验丰富的生动表现。河姆渡先民的狩猎工具主要有骨镞（箭头）、骨锥、骨哨（以声诱捕）、鱼镖、石球、陶弹丸等。猎物：鹿、禽鸟、鱼、鳖。

遗址还出土了6支木桨，有桨必有船。河姆渡人使用的船桨是目前全国已发现的船桨中最古老的一支。

木井

汉字“井”的构造，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正确的答案。随着河姆渡遗址中“井”字结构木井的发现，才获得明确的答案。

食物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居民很早就已经结束了极为原始落后的茹毛饮血、生吞活剥的时代，他们的饭食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说是很不错的。耜耕农业的发展为河姆渡人提供了大量的稻米，大米成为主要的食物。杵臼是利用表皮摩擦净皮去壳的一种谷物加工工具。河姆渡人烧食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火上烧烤，二是用陶器炊煮。釜是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中最主要的器形之一，就是古代的锅，遗物中有陶灶、釜底锅巴。另外常用的还有钵（饭碗）、盘（菜盘子）。河姆渡人经常吃的素菜有葫芦、莲藕等。至于荤菜就更多了，河姆渡周围活动的一切动物，几乎都是猎取的对象，同时也就成了他们菜盘里的食物。

河姆渡人的确还有极落后野蛮的风俗习惯，其最野蛮之处就是把婴儿和鱼放在一起煮了，因为在一只陶釜底部的一堆鱼骨中发现有初生不久小婴的颅骨。这说明河姆渡人还有人吃人的习俗。

陶器

陶器是人类生活的日用必需品，炊爨、进食、宴饮、汲水、储藏等都离不开它。陶器的制作比较方便。人类自从发明陶器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质料、造型、工艺、装饰等各方面都在不断地改进提高。各个时代所造的陶器都不会雷同，各自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河姆渡文化的陶器有着极为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在质地、造型、种类、制法、纹饰等方面都表现得很突出。遗物中有着大量的夹炭黑陶。这种陶器别具一格，他处很少见到。在河姆渡文化发掘所得的几十万件陶片中，主要的有釜、罐、盆、盘、钵等。河姆渡文化的陶器制作全凭手工操作，没有使用机械操作的任何迹象。第四文化层以夹炭黑陶为主，第三文化层已有一部分不羸炭末而加细砂的夹砂黑陶。第二文化层进而分化出夹砂灰红陶、泥质红陶、泥质黑陶等陶系，夹炭黑陶已被夹砂红陶所代替。到了第一文化层，就有了更

为细腻的泥质灰陶，并在造型、种类上显得更为繁复多样。

骨器

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遗址，有着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它除了石器之外，有着更多的骨器，第三、第四文化层单是骨器一项就有3000多件。种类有骨耜、骨镰、骨镞、骨哨、骨鱼漂、骨针、角锥、骨梭、骨针、骨匕、骨棒、骨凿、骨笄、蝶形器等20多种。它们可以用于农业、狩猎、捕鱼、纺织、缝纫、装饰等。大量使用骨器是河姆渡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文化特征。

石器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只有600多件，器形有石斧、石镰、石凿等较为简单的几种。

木器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古老的木器，有木纺轮、木刀、木匕、木铲、木矛、木碗、木筒等。

编织物

穿衣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保暖、遮羞、审美，是人类穿衣的基本目的，纺织就担负着解决人类穿衣问题的重要职责。但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可言，只是用点树皮树叶来遮遮身体而已。后来人类学会用兽皮来做衣，又发明了骨针，用兽筋做线，把兽皮缝缀成衣服，穿到身上。但是穿兽皮衣服在冬天尚可，春秋时节就不大行了，夏天就更背时了。经过无数次的摸索，人们发现有些植物的纤维可以用来纺纱织布，再经过缝纫，就可以做成衣服。尽管这样的衣服起初并不怎么雅观，但毕竟比披树叶和兽皮强多了。最早被用来纺织的就是野生葛藤、麻类植物，最早的纺织工具是石纺轮。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有苇席、绳子等。编织的材料有荆条、藤条、竹子、葛、麻等。

工艺美术

河姆渡文化除了物质文化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河姆渡人的原始艺术行为是很活跃的。他们利用堆塑、刻画等形式，在骨器、陶

器、石器、木器上留下了许多不朽的杰作。他们把它用来装饰人体，把贝壳钻孔后连成一串，围在胸前或脖子上，这就是原始的项链。他们用颜料涂身，用骨笄束头发，在骨笄上还刻上美丽精巧的花纹。发掘出的玦、璜、管、珠、环等装饰品多取用半透明的莹石质，在阳光下闪烁着清淡的绿光，晶莹可爱。且质地松脆，容易加工。他们雕刻兽牙做成胸饰、头饰、颈饰、耳饰，以及挂饰等。他们还在陶器、木器上拍打出多种花纹。值得一提的是象牙蝶形器上雕刻的双鸟朝阳花纹（河姆渡文化的标志），以及骨匕柄部雕刻的双鸟花纹。以原始的工具能创作出如此妍丽精美的作品，真叫人惊叹不已，拍案叫绝。

总之，7000年前的河姆渡先民创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文明奇迹，那先进的稻作文化、精巧的木结构建筑、瑰丽的古陶、神奇的原始雕塑艺术，蕴含着姚江先民的非凡智慧和开拓精神。

田螺山遗址

田螺山遗址发掘于2004年2月，位于余姚三七市镇相岙村的田螺山周围，遗址总面积约30000平方米，分为6个文化层，距今年代约为5500—7000年。出土文物中包括大量植物遗存和动物遗骸及纺织工具等。田螺山遗址的发现，完成了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在姚江流域空间分布“由点到面”的历史跨越，其多层次的干栏式建筑以及埠头、独木桥等遗迹对河姆渡文化聚落研究具有关键的价值。该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建有现场考古发掘馆。

井头山遗址

井头山遗址，发现于2013年10月，位于余姚三七市镇官桥村西侧，东距田螺山遗址约1.5公里。井头山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800年至8300年之间，早于河姆渡文化年代上限1000年以上。井头山遗址文化面貌独特，是迄今为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一处海岸贝丘遗址，也是浙江发现的首个史前贝丘遗址，为探索海洋文化之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余姚是中华大地最早发育的地域之一。拥有七千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雄辩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井头山、河姆渡、田螺山三大史前遗址，比较完整地构建起中华先祖与海洋共生的文明序列，是中华海洋文化的源头。

虞舜故里

余姚为舜帝故里。舜，称虞舜，又称姚舜，是我国上古时代民族开创时期的杰出领袖，和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并称“五帝”。是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原始部落联盟解体前的三个大酋长（尧、舜、禹）之一。自黄帝至尧，属母系氏族社会，生产发展史上属渔猎时代；自舜开始，父权制逐渐形成，开始进入农耕社会，舜即是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舜出生在余姚城之西约10公里处临近姚江之畔的诸冯废墟，亦称作姚墟。舜的父亲叫瞽叟，身份卑微，属平民百姓。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中载：“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华，字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舜原姓妫，因为后来舜做了尧的女婿，按母系氏族社会的规矩，舜是入赘于尧，不能再姓妫，即以出生地姚江的“姚”为姓，由此称作“姚舜”。

《孟子·离娄章句》中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汉代的赵岐对此句作注说：“诸冯，地名也。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浙东吴越境内有舜的遗迹可查，并有古文献做依据。拥有披发文身的习俗且紧临钱塘湾的滨海之地，正是舜出生之地。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晋代周处的《风土记》写道：舜“耕于历山，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析，故曰历山”。

唐代的《括地志》说：“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又有姚墟，舜生处也。舜姓姚，故云余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黄宗羲在《孟子师说·舜生于诸冯章》中写道：“今余姚、上虞两县，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经余姚者曰姚江，亦曰舜江。其水之

经上虞者曰百官江。余姚有历山。然大概舜之生在余姚、上虞，故曰‘东夷之人’。”

姚舜体格魁伟，龙颜大口，皮肤黑色，身長六尺一寸（约合今1.77米）。舜的生父有眼而不能分别好恶，故时人谓之瞽，称之为瞽叟。舜母早死，瞽叟娶妻，生下弟弟叫作象。象自小就顽傲无理，后母却处处偏袒亲生儿子象。姚舜为人孝顺，对父亲、后母及弟象，日日笃谨，小心勤事，但总不能得到生父、后母的谅解，一有小的过错，就受到罪罚，甚至无故受罚，但舜始终不改孝顺之道。

到20岁时，姚舜的孝顺之声已远近闻名。据《孟子》记载：“舜居住在深山之中，与木石同处，与鹿豕同游，他的处境几乎接近于野人。但每当他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桩善行，便决然地推行，这种力量好比江河决了口，哗啦哗啦的没有人能够阻止住。”

每到农忙时节，舜即勤耕于历山。历山在余姚城东北约14公里处。待农忙时节一过，姚舜即到历山北麓的海边捕鱼，或者到河边制作陶器。

约在姚舜30岁时，帝尧想找一位将来可以继承帝位的人选，就召集部落联盟会议，四岳等众人推荐舜，说：“舜父顽，母奸诈，弟傲，而舜仍能和睦孝顺，众人得到治理，不至于奸。”认为舜孝悌可用。尧帝说：“我就对他考察一下，试一试他的才能。”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姚舜做妻子，从内部对姚舜进行考察。尧又派9个儿子与姚舜共处办事，从外部对舜进行考察。结果，姚舜教导娥皇、女英两个妻子要谨守妇道，不可认为是尧帝的女儿就轻视亲戚，以贵骄事人；尧的9个儿子亦皆跟从姚舜参加农业劳动，谨慎从事，处处勤奋，学到了许多有益的品行。

瞽叟爱惜后妻所生的儿子象，象即此持势专横，为了独吞财产，多次设法想把舜杀掉，舜只好每次设法避逃。

某一日，瞽叟叫姚舜去修理仓库的屋顶，当姚舜爬上仓顶后，象即抽掉了梯子，在下面纵火焚烧，想把舜烧死。姚舜在危急关头，忽然听到妻子女英在房屋底下高声歌唱：“鸟会飞兮，翼之力。人而不飞，为无羽

翼。为无羽翼，何殊乎斗笠。”姚舜马上想起自己头上戴着斗笠，忙把两顶斗笠高高擎起，敞开衣衫，往下一跳，好像飞鸟展翅般地轻轻落到地上，才逃离危险。

不几天，瞽叟又叫姚舜挖一口枯井，待姚舜下挖到井底，象即去挑来泥土石块，妄图把井填实，将姚舜埋死在井中。正当象去挑来泥土石块时，姚舜将随身携带的竹钉钉在井壁上，借此爬出了井口。姚舜回到家后，仍然如从前一样地孝顺父母，爱护弟弟。虽然父顽、母诈、弟傲，姚舜却是处处不失为人子之道，尽力孝顺父母，慈爱兄弟。

舜治理本部落卓有成效，他领导百姓发展生产，遇到干旱便替百姓凿井，遇到有虎豹出没的山村，便不顾个人安危，立标志警告人们免遭伤害。他不仅获得老百姓的爱戴，还搜罗了一大批人才在身边。舜的好友有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识、秦不空等，都是国中贤人。舜的行为逐渐获得各氏族首领的支持，很快，凡舜所居住的地方，即有众多百姓追随，一年成聚，两年成邑，三年成都。

尧帝叫姚舜去治理百官。当时，高阳氏有才子重、益、禹、皋陶等八人，叫作“八恺”；高辛氏亦有稷、契、朱虎、熊黑等才子八人，叫作“八元”，此16人能够真心为百姓办事，使百姓得到较大的好处，深受人们的爱戴，然而尧帝未能任用他们。舜开始理事，首先叫“八恺”任司空职责，管理全国的土地田亩，教导百姓不失农事，勤力耕作。又推举“八元”担承司徒职责，管理全国的政教，教导百姓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之达到社会安定，外族睦化。由于舜待人公正合情，得到百官的信任，各部门理事迅捷适当。

尧帝在70多岁时得到舜，又过了20年之后，因年老而叫舜代理天子之政。舜执政之后，即把性情暴烈的共工流放到幽陵；把曾推荐共工、举人不当的欢兜放逐到崇山；由于三苗多次作乱，即将三苗迁到西裔；因鲧治水无功，殛鲧于羽山；改变四夷的风俗，四方安宁而天下信服。尧帝儿子丹朱为人不肖，尧帝认为丹朱不能够继承帝位。

再过8年之后，尧帝死，于是舜践履天子之位，是为舜帝。这一年，姚舜已61岁。舜帝勤奋理政，有他独特的治国方略。舜仿效天地的运作，顺应天地自然之法则来治理天下。

舜巡行四方，考察民风，祭告山川神灵；统一度量衡；修五礼，朝诸侯，行厚德，远佞人，明正典刑；开肇十二州，疏通川流。当时，有个凶人叫混沌，有个恶人叫穷奇，有个顽童叫涛杙，有个贪人叫饕餮，不可教训，世受其害，百姓对这4人极其厌恶。尧帝在世时，对这4个坏蛋没有处置办法。舜帝即把这4人流放到4000里之外的四裔之地，使社会获得安定。舜帝还礼聘贤能之人，要他们辅佐治理国家。他叫皋陶担承狱官之长，负责刑狱，天下狱平；叫伯禹担承司空，负责礼仪，天下出现推让之风；叫垂负责工师，天下百工各有成就；叫益负责山泽之事，荒林得到开辟；叫弃负责农业，百谷得到丰收；叫契负责司徒，教百姓亲和；叫夔主管音乐，用乐曲去教导百姓，使人们温宽刚简，人际和顺；叫龙负责宾客接待，使远人信服；叫禹负责治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九州各以当地的物产来向朝廷进贡。他要求百官敬事职责，不可怠慢公事。他还每3年对百官进行一次考功，经三考之后不合格的官员，按责任轻重予以处罚或罢免。如此一来，内外百官都勤于公事，谨慎治民，远近众功兴旺。四海之内，都感戴舜帝的功绩，故此有“天下明德皆自姚舜始”的说法。

舜帝的治国之道以“孝”为本。“孝”使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每个家庭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即可延伸到民族、国家，可以达到民族和国家的整体繁荣，达到社会和谐。舜帝正是用孝去协和万邦，睦化四海。自此之后，历代英明的君主都主张以孝治天下。由于孝道顺乎人类亲情天性，具有维护社会安定，创建和谐社会的巨大作用，故为人们乐于接受。由尧帝和舜帝所倡导的“孝”，伴随着历史发展而来的“父慈子孝”，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团结、安定、和谐、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舜帝是农业文明的始祖，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可以说，舜是由渔猎社会进入农耕社会这一转化时期的主要引路人。

当舜年近百岁时，他开始思索接班人的问题。舜的嫡长子商均不成器，舜不让他继承帝位，而是选择了禹。舜到晚年把权力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自己则巡游天下。舜南巡至苍梧之野，因劳累过度，不幸遇疾而故，终年百岁，在位39年。埋葬在九嶷山，即称之为零陵。舜帝死，诸侯归服于大禹，于是大禹继承了天子之位，是为夏禹。

夏禹将舜的儿子商均封于虞城，即今河南虞城县。后又移封于商，迁到陕西商县。商均后裔之一虞思仍居虞城旧地。舜的另一儿子箕伯的后裔虞遂，始终留居在原来的国都蒲坂城附近的虞乡，以统辖有虞氏部落。在整个夏王朝，舜的子孙繁衍，就开始向南、北、东方边远地带迁徙。在浙东，姚江两岸的虞姓、姚姓、商姓、妨姓、余姚氏、濮阳氏等，即为舜的后裔子孙。随着岁月的变迁，舜的子孙蔓延国内外，相继争辉。

两宋时期的余姚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两宋王朝是一个比较知名的时代，所谓汉、唐、宋、明、清，各有非凡的成就，在国人的心目中留下极深的印象。但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有一些史学家往往笼统而又简单地把两宋说成是一个积贫积弱的腐败王朝，未能全面地来认识两宋时期给祖国的历史发展做出的贡献。实际上，两宋时期的统治者，在政治上虽说较少有大的作为，又恰恰遇上了强大的辽（契丹）、西夏、金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反复入侵，以致到南宋时期只能保有半壁江山，但我们更要看到，处于这一政治、军事环境之下，遭受“靖康之耻”这一重大灾难之后，在外族强敌虎视包围之下的南宋朝廷，尚能坚持150多年，而且在江南半壁中取得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直到最后，它才被更为强大的元朝所灭。其中自有不少的历史原因，可以引发我们后人思考。

唐代末年天下再次大乱，群雄并起，五代十国，纷争不息。中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了东南。接下来赵宋建国，很快就把中华文明推上了又一高峰。正像陈寅恪先生所极言的：“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李约瑟也强调，宋代的科学与技术是当时世界高峰。这有个原因，便是宋代经济非常发达。我们暂且举“小说家言”的有趣例子，就可看出个大概。《水浒传》中，豹子头林冲不过是个尉级军官，居然能从口袋里掏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按当时的兑换标准，1贯钱约合1两白银，1000贯钱就是1000两银子。武大郎，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却住着一楼一底，还有钱供给潘金莲穿金戴银。这些不是孤例，宋话本小说里多的是。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当时汴梁城门口一名老兵，生活得比欧洲的国王还好。司马光也大发感叹：“世风日下，贩夫走卒皆着丝袜。”这话带点酸味，却说明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富裕。

问题是，宋代到底采取了什么制度，才促进了经济，达到如此高度发

达？中国历史有一个规律，短命王朝虽短小，却用自己的性命，为接下来的长命王朝奠定典章制度的基础。所以，“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宋代则是“承唐制”。

必须注意的是，就在这高度发达的宋代，更有一方乌托之邦，那就是人文荟萃、经济富裕、百姓安宁的两浙地区。从唐末至宋初，这里有一个以吴越王钱镠为领袖的吴越国。钱镠推行的政策，是“以人为本、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繁荣经济、造福地方”。苏东坡也特别推崇：“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他两度出任杭州地方官，前后大约5年，亲眼所见，说话必有根据。余姚正处在这吴越国境内，故此才有了“东南最名邑”之佳誉。

以往，在我们对余姚地方史的研究中，也是注重对明清时期余姚历史的研讨，而两宋时期的余姚未能引起学人的关注。当然，有关记载两宋时期余姚事迹的历史文献极为缺乏，这也是其中一个较大原因。在此文中，笔者试作记述，以引发学人对研究两宋时期余姚成就的兴趣。

经济、社会建设方面

两宋时期的中国北方，长期处于战乱环境之下，边境百姓流离失所，经济、生产和建设遭受重大影响。余姚由于远离北方边境，在整个北宋时期基本没有遭受战争的创伤，经济、文化仍然获得重大发展。宋庆历七年（1047），著名诗人谢景初出任余姚知县时，当时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送谢景初迁凭宰余姚》诗中写道：“世德践甲科，青紫信可拾。故乡特荣辉，高门复树立。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又得贤大夫，坐堂恩信敷。春风为君来，绿波满平湖。乘兴访隐沦，今逢贺老无。文藻凌云处，定得江山助。未能同先舟，离樽少留驻。行行道不孤，明月相随去。”诗中提出余姚是“东南最名邑”，并不是信口开河，自然有着一定的依据。作为曾经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进行过“庆历新政”改革的范仲淹，对全国各地的情况是深为了解的，他将余姚看作“东南最名邑”，自有着他对其的评价。由此可知，当时的

余姚县定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方面超越了其他县，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也因此朝廷才会委派知名人士谢景初出任余姚知县。

谢景初担任余姚知县后，果然不负众望，为余姚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大量的实事，其中有3件大事更为要紧。第一，知县谢景初为了方便姚江两岸人们的往来，在江北故县城的南门外姚江上开始筑桥，当时用竹木跨架姚江，初名德惠桥，俗称虹桥（虹读jìàng）。此桥之建成，为余姚的经济发展、生活方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时姚江上尚无其他的桥，故称之为“浙东第一桥”（入元后改筑石桥）。第二，鉴于姚北沿海时常发生海溢，海边百姓遭受海侵之灾难，人为鱼鳖。谢景初即召集民工修筑海塘，自云柯乡达于上林乡，筑堤长约9.3千米，保障了姚北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牟山湖是姚西北农田最重要的水利保障，原有水面积500顷23亩，时至庆历年间（1041—1048），被地方豪强占湖为田，水面积缩小至只剩1/3，严重影响了姚西北的农业生产。另有泗门的汝仇湖亦是如此。知县谢景初即时下令，限定时日逼令豪强退田还湖，使这两湖水面积基本恢复到原有水面积的4/5，维护了余姚的农田生产。同时还增做放水土门，组织人员编写《湖经》，将湖界、田界做了新的规定，对受水乡域农田做了划分，共灌田22780顷（可惜的是，至元明时期，这些湖又被豪强所侵占，水面积大大缩小）。

由于常年遭受海水侵袭，到庆元二年（1196），姚北沿海堤塘又遭溃毁，知县施宿看到这一情况，即时召集民工，修筑自上林乡至兰风乡海堤长约14千米。同时规定，以上林乡沙田及汝仇湖、柚木湖等处的废田2000余亩出租，以租税额做修海塘的常备经费。至宋末的祥兴年间（1278—1279），堤又溃毁，有知县牛秘丞岁发民工6000余人，修筑石塘，以保障姚北百姓的安全。

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农民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在租佃制度之下，佃户只需向田主交纳租谷，而不再是田主的私属。完全改变了两晋时期余姚佃户被虞氏豪族独霸为私有，隐瞒户口田亩的情况。

由于水利建设的保障，生产工具的改进，农民人身归属的自由，知县对农业生产的鼓励，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2倍多，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姚江流域成为当时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当时余姚也种桑养蚕，余姚的蚕丝、茶叶、山笋、毛竹和竹制品、土纸、海盐、海鲜大量外销，其中以茶叶、海盐为主要外销货物。

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生产大为发展，市民阶层和商人地位提高，市场经济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县治所在的姚城内，虞宦街一派繁荣景象，店铺、作坊林立，形成了较新颖的商业格局，南北货物汇聚，交易额大大提升，大大改变了在唐代之前，虞宦街为虞氏一家所独霸的状况，使其真正成为余姚县民自由交易的主要场所。由于虞宦街东依县衙，南滨姚江，加以虹桥之建成，交通之便利，自虞宦街至姚江边，遂成为余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随着姚城内市场的兴旺，乡镇集市亦紧追直上，梁弄、陆埠、泗门、马渚等处的市集，山货海珍辐辏，每遇约定的市日，人声喧闹，热闹非凡。尤其当庙会之期，外地客商纷纷会聚余姚，带来南北各地的珍异货物，东起虹桥北堍，沿城外姚江边一直往西，直至西石山渡，沿江边、城脚摆满各色生活用品和多种生产工具，应有尽有，一派升平繁荣景象。

自宋都城南迁至临安（杭州）之后，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南移，大批皇族、贵官、北方巨族随驾南迁，众多的皇族择居姚江两岸，现今的余姚赵氏即是当时卜居余姚的赵宋皇族后裔。同时，王、谢、郑、邵等巨姓亦随着迁居余姚。皇族贵官迁住余姚，给余姚带来了北方豪族的生活风情、习俗，皇家气派的奢侈享受，反过来又对余姚市场消费经济产生了极大改变，提升了百姓生活消费水平。按文献记载，自宋之后，直到中华民国时期，余姚人的生活水平较为豪华奢侈，讲究气派排场，这应该说是受两宋之交皇族南迁姚江所造成的奢侈习气的熏染。

文化教育方面

赵宋王朝虽在政治、军事方面相对较弱，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这首先取决于赵宋王朝最高统治阶层：赵宋历代皇帝，以及赵氏皇族，都是爱好书画的文化人，本身也是著名的书画家，于是特别强调保护文化意识。按宋代文献史料记载，宋王朝对文化、教育特别重视，大力提倡文化活动，关注教育，关注文化人的培养。并规定凡是文化人、文化官员，无论犯有何种重大罪行，都不得处死。于是，日本学者曾说宋代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学者刘子健也说：“此后中国近800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宋代“崇经办学”，官学与私学都很兴盛，培养了极多的文化人，如周敦颐、二程兄弟、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氏父子三人、王安石、曾巩、朱熹等，即是著名代表，又因由他们在皇家的倡导下的文化教育行为，振兴了宋代文化。

在朝廷重视文化教育的政策之下，余姚学宫也相应获得较大发展。余姚学宫从汉代建立，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一直处在现大黄桥路位置，范围比较狭小。宋庆历年间，诏天下各县凡学生满200名的扩建学校，余姚知县谢景初即将学宫进行扩建，初具规模。至元丰年间（1078—1085），知县黄铸动员地方富户莫当等出钱，买得现在学宫位置旧宅址，新建学宫，开辟四衢（南学弄、杜义弄、东举弄、西黄弄），以引来四方学者，增招生员。余姚县学置学长、学谕、直学、斋长、斋谕各1名。有正式名额廩膳生（俗称的秀才）50名，有附生三四百名，与廩膳生共同学习。有学田，以保障教育经费的开支。于是，余姚士子读书有了极好的场所，每月每生有月廩银，有统一的教材，众多士子可以安心地在学宫里学习。

绍兴五年（1135）的余姚知县徐端礼，绍兴七年（1137）的余姚知县赵子灞，绍兴十五年（1145）的余姚县尉史浩，均关注教育事业，认为教育是治道之大本，庠序是教化之先务。主动捐出私俸以倡学，先后增建讲堂、斋舍、射圃、观德亭、绎志亭。庆元五年（1199）知县施宿增建值舍

作为致斋、考课之所，扩建了正门，气势宏大壮观。咸淳九年（1273），知县赵崇简认为余姚“为帝舜旧地，设学校以教人”，对学宫进行全面整修：学宫内东轴线为孔庙，崇圣祠祀先师孔子，旁列配享，有土谷祠、文昌阁、魁星阁、训导署、教谕署等；中轴线有棂星门、儒学门、东西庑廊、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西轴线在修整斋堂、号舍时，更新增建了乡贤祠、名宦祠、忠义祠，形成体势完备的格局。赵崇简知县更向生徒们说：“今之教即古之教也。古无利禄之诱，今有利禄诱之。假如学人将读书作为钩致利禄之具，疲其神于破碎之大伦，反不知实践，而无所愧乎？”要求在学生徒以读书结合实践，做一个品格完美的人，不要以读书来追求做官，把它当作进入仕途之门的敲门砖。

科举（秀才、举人、进士）是封建时代读书人唯一的进身入仕之途，每3年一考的进士考试，录取名额的多少标志着该地区的荣誉，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层次。又加以宋代“寒门入仕”的宽宏政策，无论贫寒豪富，读书之人大增。余姚历来重视教育，教育有方，在科举上亦大大领先于全国各县。余姚考中进士的人数，唐代以前因文献资料缺乏，难以考索，自南宋至清末，余姚共有进士635人，其中唐代3人、南宋134人、元代7人、明代390人、清代101人。

南宋绍兴五年（1135）乙卯科，全国进士220人，余姚有胡沂等11人；淳熙二年（1175）乙未科，全国进士426人，余姚有孙应时等10人；嘉定元年（1208）戊辰科，全国进士426人，余姚有余一夔等10人；咸淳十年（1274）甲戌科，余姚有陈应庚等13人，各科均居全国各县之首，由此可知余姚教育非同一般之成效。

在余姚考中进士的学人中，宋代有两人考中一甲进士及第：第一位是南宋庆元二年（1196）丙辰科的莫子纯（1159—1215），字粹中，莫氏是余姚巨族，住余姚城东南隅待士坊（现南城学弄至东朝街）莫家弄；第二位是南宋景定三年（1262）壬戌科的方山京，字子高，他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时期，出生于余姚县四明乡（梁弄）姚巷。他幼年丧父，家庭贫

困，力学不辍。他曾读书于余姚西部长冷江边之处，入仕后建桥于此，后人称之为“方桥”。

自隋唐时期推崇科举后，宋代在科举考试中以儒学为本，学子遂专注于儒学，走科举之途。于是，在姚江流域产生了众多的儒学教授，为姚江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终身贡献。姚江流域的优秀学者，不但自身学以成名，极为关注教育，而且积极投入于教育活动，作为学术的“薪火之继”，使姚江流域的文化教育如环相扣，代代承传。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胡宗伋、孙介、孙应时等。

胡宗伋（1079—1148），字浚明，号定翁先生，姚北柏山人。宋元符（1098—1100）年间，胡宗伋应试礼部后，出任余姚教授。他以平实的学识、磊落的人格，赢得了县学生员的崇敬，在学生徒都师从于他。南宋建炎之乱后，北方士大夫纷纷避居姚江两岸，他们信任胡宗伋之为人，多投奔于他。建炎元年（1127），胡宗伋被调任房州文学，不久又调任浏阳县丞，均因教授有方，政绩显著，被推荐任严州知州。到严州不久，文风一时大盛。后胡宗伋再转任德兴县丞。在任期间均能推崇教育，振兴文风，史称“醇儒”。

胡宗伋于教授之外，亦勤于追求学问，他的学术观点为其弟子烛湖孙畴、孙介兄弟所继承，三传至孙应时。他的著作由其学生孙介编纂为《胡氏贤训》。

余姚有大族孙氏，世代官宦人家。传衍至五代时有孙子昇，回家营葬父母，利用3年守孝期，把侄儿们召集一起，为他们讲授《论语》《孟子》《诗经》《周礼》等书。

孙介（1114—1188），为南宋初年姚江著名的实学家。在家设馆，授徒自给，开始了他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可谓“终老为童子师”。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由于家境贫寒，无法承担大量购置图书的开支，他便将诸经正义、诸子书、《战国策》、两汉至隋唐五代史、百氏文集、异闻杂说等择要誊抄，以供教授之需用。

孙介继承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根据学生的禀赋个性、兴趣爱好，实行“随材指授”，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培养他们各自的特长和天赋，使之得到提高和发展。由于孙介深厚的学养、优秀的教育理念和高度的责任心，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在他的门下先后出现，李友仁、茅宗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名师出高徒，高徒再进而向四方推介和传播师说，孙介遂渐成为明越两州间颇具声望的名师，被学者尊称为“雪斋先生”，远近塾馆都慕名争相延聘他去坐馆设教。

孙介家庭清贫，为了办学所需，以及资助艰难的生徒，先后将仅有的40亩田地丧失殆尽，犹捐衣辍食，以周济教育。邻人好友有资助者，孙介却忍穷如铁石，认为取人钱财非其义，坚拒不受。矢志办学教授50余年如一日，为乡里和邻境培养了大批学子，真正是为教育事业做出终身贡献的民间教育家。

孙应时（1154—1206），号“烛湖居士”，孙介的幼子。在太学读书数年，结识了赴京参加会试的陆九渊，即拜陆九渊为师，很快步入了心学研究的大门。淳熙元年（1174）八月末，孙应时又与婺学宗师吕祖谦结交。孙应时在22岁时考中进士，但不想马上出仕为官，而是回乡讲学3年，培养了一批读书人，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淳熙五年（1178）后开始做官，淳熙八年（1181）十二月，孙应时与朱熹一见定交。淳熙九年（1182）春，孙应时辞职回家。当时致仕家居宁波甬城的右丞相史浩获知孙应时辞职家居的消息，即时派人请孙应时到甬上东钱湖讲学。

此外还有北宋时期的陈橐，字德应，任宁州教授；南宋时的岑全，任临安府教授，有子珍仙，任仙居教谕，孙子岑翔龙，入元后任江陵教谕；梁弄的孙炳炎，宝祐元年（1253）任福州教授；何林，宝祐四年（1256）进士，与沿海制置使齐黻合力倡议，创办余姚高节书院；叶仲凯，入元终生不仕，教授乡里，蔼然有敦笃之风；杨子祥，精于《春秋》之学，教授乡邑子弟20余年以终。

南宋时期，朱熹理学被钦定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成为治理国家的

主导思想。学宫教育即以朱熹理学为基本观念，以他的《四书章句》为基本教材，培养出了大批理学人才。上述宋代余姚教育中的胡宗伋、孙介、孙应时等就是当时有一定知名度的理学家。他们继承朱熹的衣钵，传授理学，直至明代中期王阳明起而与朱熹理学抗衡，朱熹的理学思想一直是统治姚江流域的基本观念。

在文学方面，宋代是诗词大发展的时期，诗歌虽然比不上唐代，但另辟词境，在词这一方面大大超越了唐、五代。余姚即有江湖派诗人高翥（1170—1241），字九万，号菊涧，是南宋江湖派诗人中较有才情的一个，著有《菊涧集》20卷。他的一些诗具有民歌风味，语言朴素自然，黄宗羲称他是“姚江诗祖”。

王安石任鄞县知县，常至余姚与知县谢景初相会，登龙泉山饮酒赋诗，留下了《龙泉寺石井》两首：“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在此中蟠。”“人传湫水未尝枯，满底苍苔乱发粗。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卧龙无。”还有大隐镇的舒亶学士，虽有向皇帝告苏东坡黑状的不足一面，使苏东坡遭受“乌台诗案”的冤狱，但在诗词方面有着较大的成绩，是北宋时期较为著名的诗人之一。

绍兴二十年（1150），史浩任余姚县尉，到任后，即封表余姚先贤严子陵墓道，创建客星庵以祭祀严子陵。施宿于庆元二年（1196）增修学宫、修治严子陵墓、添置书院。

还有一个文化型的高官孙子秀（1212—1266），字元实，号静见，余姚县四明乡梁弄姚巷人，为官期间极重视儒学，为孔庙建设做出了重大业绩。早在建炎二年（1128），宋室南渡，建都临安。孔子第四十八代孙衍圣公孔端友及部分族人从宋高宗南下，赐居衢州，朝廷下诏暂且以衢州学宫奉祀，因循逾年，没有专享之庙。淳祐十二年（1252），孙子秀出任衢州知府，即利用圯毁的佛寺，按照曲阜阙里的格局样式，特于衢州城内菱塘创建孔子家庙，沿中轴线建有庙门、仪门、大成殿、思鲁阁。阁上祭祀南渡时从曲阜移来的孔子和亓官氏夫人的楷木像。建成之日，即率领在

衢官员施行释奠典礼。孙子秀的这一举措，为恢复孔庙礼制，复兴、弘扬儒学，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南孔家庙至今保存完好。景定五年（1264），孙子秀任临安知府，一年后，病卒，年56岁，安葬于余姚梁弄西邻的建隆吞象鼻山腰。孙子秀墓是余姚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宋代古墓葬，1987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余姚土纸的量多质优，《资治通鉴》即在余姚印行。司马光等于元丰七年（1084）完成《资治通鉴》共354卷，于元祐元年（1086）奉圣旨下杭州刻板，但未完成。时至绍兴二年（1132），重议刻印《资治通鉴》事宜，鉴于余姚特产有竹纸，即由两浙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刊板，由余姚学人钱移哲等10人、嵊县学人娄谔等9人任校勘，由余姚县主簿王纲负责。自绍兴二年七月一日开始，至第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毕工，印刷后进呈。事成后，任校勘的19人俱获赠进士出身。

正由于宋代的余姚是雕版印刷大发展的时期，购买图书相对容易，余姚学人即大量购置图书，收藏书籍，众多的私家藏书又给学人读书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如著名学人赵师龙、孙介、李必达、张元鼎、茅宗愈、高似孙、高翥等人家中各有大量藏书，其中张元鼎有“风雨斋”藏书，高翥有“信天巢”藏书。

南宋孙介因家贫无书，就将诸经史志亲手抄录，或删其要语，楷书细字，不辞艰辛。南宋茅宗愈也是将经史百氏，细字手抄。南宋高翥是“破屋三间书五车”，他曾在《谢人惠书籍》中写到友人赠书于他时的快乐：“插架有时防鼠啮，藏家无力买香薰。不如随处堆床几，检阅时时似对君。”《自题诗》中还表达超脱尘俗的意趣：“信天巢小仅容身，中有图书障俗尘。不与世争闲意气，且随时养老精神。”高似孙家有“玉峰堂”藏书寮，他自幼熟读典籍，利用家藏书籍，著有众多目录学著作，如《经略》《集略》《诗略》《史略》《子略》《纬略》《骚略》《蟹略》《续古集》《遗稿》《文苑英华钞》《砚笈》《文选句图》《目录》《剡录》《烟雨集》等多部。

军事斗争方面

两宋时期，朝廷处于外患深重的艰难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部分统治阶层处于苟且偷安的情景之中。也恰恰于这种情景的促动下，极多民族志士的情感被激发，起而向外族入侵者坚决抗争，例如，宗泽、岳飞、韩世忠、张浚等大批抗金英雄。其中有人因对统治阶层不满，起而反抗，以改善自身现状。在抗金斗争中，余姚虽然不是处在抗敌前线，但整个抗金报国的情景，同样得到余姚人的配合，他们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当然也因官军的暴逆行为，余姚遭受到重大的创伤和损害。

宣和二年（1120），方腊率农民起义军数千人来到余姚，欲从候青门进城。知县与将军刘述古率领官军、乡勇在龙泉山北拒守，深挖战壕。方腊军只好取道凤亭乡，从南向攻城，与官军大战于最良桥，招致败绩。此桥亦因此而取名为战场桥。

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高宗为躲避金兵追踪，经渡曹娥江来到余姚，趋明州（今宁波）入海，转赴温州。待金兵临近余姚城时，知县李颖士募乡勇数千，奋起拒守。金兵不测地势，又不知城守兵军多少，不敢进攻。

建炎四年（1130）二月，金兵攻明州不下，收兵回去，途经余姚，回杭州。建炎四年四月，高宗从海上回程，途经余姚，登上龙泉山，饮用中天阁东侧的龙泉井水，觉甘甜，取十瓮送至绍兴。

德祐二年（1276）正月，宋王朝即将破灭，承宣使张世杰率官军逃过余姚，张世杰身为名将，但不能管束部属，任军兵胡行，焚毁城隍庙、学宫；到三月，又回军至余姚，纵军大掠而去。

随着宋王朝的灭亡，不少抗金、抗元的民族志士做出了重大牺牲，受到国人的赞誉。就是这些抗敌英雄的后人，有不少就寓居余姚，成了余姚人。如梁弄建隆吞张姓子孙，即是尽力抗金、矢志不渝的南宋名将张浚后裔；化安山剡湖吞陆姓子孙，即是为避免做元军俘虏，背着末代宋主赵昺投海自尽的左丞相陆秀夫后裔。

上述仅是宋代余姚历史情况的概貌，不及细说，但从中可以概见宋代的余姚，业绩不凡，同样对祖国的宋代历史文化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借鉴宋代成果，提升余姚品位

纵观余姚历史，借鉴宋代成果来提升余姚的城市品位，这是当前极为紧要的举措。所谓城市品位，就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和经济面貌，是现实生态和历史传统的结合，是市民的文明程度、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共同社会心理的总和，是市民综合各种要素而给予城市的整体评价。简而言之，城市品位就是一座城市的建设档次和魅力，它直接关系到城市未来发展的水平和潜力。

余姚的建设已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在影响城市品位的诸多要素中，文化品位排在首位。一个高品位、有魅力的现代化城市，必然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因为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是一座城市品位的主要标志。专家断言：现代城市以文化论输赢，高品位的人才喜欢高文化品位的城市，高文化品位的城市也必然吸引高品位的人才。因此，以文化品位提升城市品位，塑造城市形象，展示城市品牌，推动城市发展，理应成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中之重。余姚精神中提到“崇文崇德”，这是恰到好处的实在表述。

城市文化既有精神文化的因素，又有物质文化的因素；既有现代文化，又有传统文化。要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就必须对各种文化兼容并举，集约开掘。体现在城市建设风貌上的主要是物质文化，体现在市民身上的主要是人文文化。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市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城市文明的水平。因此，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不但要建设具有文化神韵的城市风貌，更需要不断提高市民的整体文化素质。

在这几方面，宋代的余姚历史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明确的启示：

宋代的中国，在整体上来说是比较贫弱的，在文化上却是辉煌的；北方处于战乱之中，南方却相对安定；不少城市遭受战争的破坏，余姚却获得了意外的发展。笔者认为，其中文化的因素有它不可忽视之处。

在几任有业绩的余姚知县中，文化型官员起了极大的作用，谢景初的扩建学宫、筑海塘、退湖还田，黄铸、赵崇简的迁建学宫、建造学舍，史

浩的封表严子陵墓道、建客星庵进行祭祀，施宿的增修学宫、修治严子陵墓、添置书等，几次重大的文化业绩，都是由这些文化型知县所成就。可以说，要想城市有文化品位，首先领导人必须有文化品位，真正从文化的意义上来思索问题，以建设现代文化型的新城市。

一座有品位、有魅力的城市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要有自己的特色。余姚人教育之普及，科举成果的名列前茅，文人学士之出众，这就是宋代余姚的特色所在。要想建设现代化的新余姚，同样需要有众多的文化人。而文化人的出现，一方面是文化人本人的自觉性和勤奋性，以完美的人文品格和丰富的多方面知识来为余姚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文化人也需要被培养和发掘。而宋代以宽松、宽容的态度对待文化人的举措非常值得借鉴，真正做到为事业信用文化人，以真感情任用文化人。这里所说的文化人，不是仅具备理科知识的技术人才，而是指既有理科知识，更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具备人文品格的学人。

经济是城市的肌体，那么文化就是城市的灵魂，是特色城市的“根源”。一座没有历史、缺少文化的城市相当于一座没有“记忆”的城市。历史文化是余姚的城市之魂，保护好余姚的人文资源，传承好余姚地方文化，是关系余姚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余姚自古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具有“文献名邦”“东南最名邑”的佳誉，人文历史资源是余姚巨大的财富和荣耀，是加快城市发展不竭的动力和源泉，也是应对其他县市竞争的优势和王牌。宋代余姚知县对余姚人文资源的保护、修缮、利用，已经给我们后人做出了榜样。在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更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加上现代文化元素的注入，来凸显余姚城市的个性，彰显文化底蕴，以展示余姚持久、深邃而现代的文化品位。

让我们关注历史上的余姚，关注宋代余姚的成果，学习余姚先贤精神，发扬余姚文化，将余姚宜居城市的环境建设得更加优美，让城市服务更加完备，城市发展欣欣向荣。

“文献名邦”题匾因由

余姚久存古舜遗风，“阳明学说”衣被天下，名人联袂、精英辈出，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赞誉，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文献名邦”佳称传扬天下。按谢迁《归田稿·赠邑宰丘君以义被召之京序》载：“吾余姚以文献称久矣！”丘养浩于正德十六年（1521）任余姚知县，嘉靖三年（1524）离任赴京，由此可知自明代嘉靖之前余姚已有“文献名邦”之佳称，美誉传扬天下。先贤遗泽，被于姚江流域，其功诚伟哉！或说“文献名邦”为皇帝钦赐余姚，但钦赐之匾额早已不存，未获确证，不知哪位皇帝所为。

按《明史·王守仁传》所载，时至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经由廷臣提议，“气节文章功业如守仁，诚宜崇祀”，神宗允准，将王守仁从祀孔庙，获配享孔子的隆高荣誉。神宗皇帝同时御笔题联，悬挂龙泉山中天阁王阳明先生讲学处：“智水消心火，仁风扫世尘。”所谓“文献名邦”钦赐之说，喜好书字的神宗皇帝是否同时亦钦赐题额，仅做猜想而已。

既有“文献名邦”之佳称，必然制有匾额悬挂，仰望“文献名邦”，可激励后人见贤思齐之心。钦赐之匾额早已不存，继起题写匾额的情况亦不得而知，亦无遗匾留存。最后3次题匾情况略述如下：

清顺治六年（1649），知县胥庭清到任，为光耀古姚风泽，特制巨匾一块，悬挂于县衙后厅，并出告示谕四方，有能题写“文献名邦”者，不惜重赏。一日，有一老翁潜入县衙后厅，提笔挥毫，立书“文献名邦”四字。胥庭清一见大喜，立赏白银百两。然而这位老翁拒绝领受赏银，拂然离去。后经人指认，此老翁名叫史鸿（1573—1652），号冲寰，77岁，家住姚城西北隅的太守房路，擅书法，独宗王右军《黄庭经》，然不为世人所知，书名不显。于是，胥知县当即亲诣太守房史鸿家，而史鸿匿而不见。胥知县只好留题“学古”二字，旌扬史门。

时至清同治年间，多年战火之后，史鸿所书原匾已残破不全，无法重摹。即由姚城名儒黄炳屋等学人礼请本邑书家翁庆龙重书“文献名邦”匾额，悬挂于县衙头门。翁庆龙原名琳，字已兰，住北城东门外，出身于书香门第，文学世家。翁庆龙幼随父居京师，后工于书法，学宋四家，于黄庭坚书致力尤深。他的书艺纵横跌宕，驰骋自喜，英俊之气，跃然纸上，被著名书家何凌汉所赏识。翁庆龙又与张之洞为知心好友。翁庆龙为人耿直，恬静淡泊，一生不得志。到晚年，穷居上海，日以卖字为生，以诗酒打发日子。每每醉后作书，挥洒淋漓，得者往往珍藏不忍弃。

民国十八年（1929）10月，鼓楼东西两侧城墙拆除，改建为滨江路，县府前东西两街改名为府前路，同时对县府头门进行修建，由原宫殿式改建成中西结合式。时由晚清举人张星枢提议由他女婿阮伯康（绍兴人）重书“文献名邦”匾额，结果遭到府前路小学校长张蓬仙等人的反对，说：“余姚的字匾为何要叫外地人来写，难道余姚就无人了吗？”众人认为张蓬仙说得有理，但慑于张星枢的威势，难置可否，善书者也不敢出来握笔。当此尴尬情景之下，张蓬仙就只得挺身自荐，说：“别人不敢出来写，那就只好由某人来代写了。”张蓬仙当即写下“文献名邦”四字，然后制成巨匾，悬挂在新县衙头门的里面（朝北面），而将翁庆龙所书的原匾悬挂于衙门内之大仙楼前。

时过境迁，历史流逝。待抗战结束，张蓬仙的题匾竟不知去向，翁庆龙的书迹却保存了下来。于是即将翁庆龙书迹临摹做匾，一直悬挂于县署头门之内侧。亦由于悬挂于县署头门的北向，就有人称余姚为“半个”“文献名邦”。

余姚历代人口

上古时期，余姚虽地处东夷荒蛮之地，但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劳作于此，开创了远古文明。自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建县之后，余姚县获得飞跃发展，随着经济、文化、政治的进步，人口也随之逐年增加。自唐始，除“赤、畿”之外，其余之县即以人口多少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新唐书·地理志》将余姚列为“紧”县。至宋代，被范仲淹称为“东南最名邑”的余姚，按《宋史·地理志》载，由于人口增多，上升为“望”县。元代时，由于余姚县户数过4万，于元贞元年（1295）由县升为州，称余姚州。至明代洪武初年，复称为县。

古代计算人口，一般按户丁计，户即一家；丁，按字义有“壮大”之意，故称成年男子为丁男。按年龄标准，历代规定有所不同，晋代以男子16~60岁为正丁；唐代规定21~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明清时期以男子16~59岁为丁。历代即以丁口、田亩之数来计算赋税，不成丁者不用缴纳赋税。按历代有关《田赋志》簿册，只计丁口，难见总人口数。但按丁口数，可以想见每户人家有丁男、妇女、老人、小孩，一般以1丁乘以4口来计算，大致相近。

自下即以唐《元和郡县志·江南道·余姚县》《元丰九域志·两浙路·余姚县》《文献通考·户口考》《雍正浙江通志·户口》《光绪余姚县志·田赋》等文献史料，参酌而计算之，列出余姚县历代人口数。

晋太康年间，3750户。按每户4口计，近15万人。

山遐任余姚县令，到任八旬即查出城内豪族虞氏挟藏户口1万多，以为私附，其中以虞喜藏匿户口最多，山遐想对虞喜处以弃市之刑。当时，朝臣中大多为虞氏朋党，众起为虞喜辩护，山遐反而被免去官职。

唐代，按《元和郡县志·江南道·余姚县》载，余姚被列为“紧”等

县，按《文献通考·户口》：“天下县邑素有等差……三千户以上为望县，二千户以上为紧县，一千户以上为上县。”余姚即为“紧”等县，应在2000户以上，人口约10万，比晋代人口数为少。

宋代，大中祥符四年（1011），有户籍21063户，41913丁。在《元丰九域志·两浙路·余姚县》中，余姚被列为“望”等县，有户籍3000户以上。嘉泰元年（1201），有户籍30883户，33145丁，不成丁10234人。

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有户籍43847户，242691口。大德十一年（1307）和至大元年（1308）连续遭受饥疫之灾，耗21447户，户口急剧下降。

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有户籍51188户，206054口。永乐十年（1412），有户籍55392户，182349口。弘治五年（1492），有户籍41419户，105132口。户口明显有所减少。仅10年后，弘治十五年（1502），有户籍41835户，154747口。正德七年（1512），有户籍41841户，156524口。是年，姚北遭遇海溢，民溺死万余。嘉靖二年（1523），有户籍41848户，158364口，其中男112588人，女45776人。万历年间，有户籍41847户（其中：民3638户，匠2050户，盐灶1576户，官31户，生员40户，儒5户，力士校尉5户，阴阳家5户，医11户，厨4户，捕快109户，兵铺皂隶116户，水马驿站坝夫112户，纸槽112户，窑冶15户，僧31户，道3户），158392口（其中男112616人，妇女45776人）。

清代，顺治年间，有户籍市丁6290，乡丁53527，合计59817丁。康熙二十年（1681），有户籍41859户，59819丁，154783口（其中男105586人，女49197人）。至康熙五十年（1711）朝廷颁布规定，凡以后所出生丁男，永不加赋。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全年增益1519人。康熙六十年（1721），有户籍62572丁。雍正四年（1726），有户籍63007丁。雍正九年（1731），有户籍62634丁，新收2078丁，开缺1705丁，实有63007丁，是年新增市民416人，新增乡民2772人，永不加赋。乾隆年间，有户籍59816丁，其中市丁6290，乡丁53526。乾隆五十六年（1791），有户籍

101384户，472916口。道光年间，有户籍59816丁，其中市丁6290，乡丁53526。

同治四年（1865），有户籍127160户；五年，127240户；六年，127420户；七年，127470户；八年，127540户；九年，127630户；十年，127890户；十一年，127960户；十二年，127920户；十三年，127930户。光绪年间，按缴纳赋税的田赋册计，有59817丁，其中：市丁6290，乡丁53527。这不可能是实在的户籍数。以下数字可能较为实在：光绪元年（1875），有户籍127990户；二年，128090户；三年，120820户；四年，128095户；五年，128190户；六年，128111户；七年，128060户；八年，127951户；九年，127900户；十年，127940户；十一年，128004户；十二年，128077户；十三年，90488户，人口大有减少；十四年，96014户；十五年，97025户；十六年，97091户；十七年，97091户；十八年，98003户；十九年，98017户；二十年，98067户；二十一年，99062户；二十二年，91305户。

同治和光绪年间的户籍数，系由吏书于造册时上报之数据，相对可信；但是，由于早在康熙五十年时规定以后所生丁男永不加赋，故此各县户科吏士造册时不再对丁口的增减严加审定核实，往往有信手增减的情况存在，不可能一定正确，仅供参考而已。

宣统二年（1910），有户籍83357户，附户37473户，630416口，其中男322224人，女308192人。

民国十七年（1928），有户籍138411户，640561口，其中男355399人，女285162人。民国三十年，有户籍153396户，703759口，其中男373296人，女330463人。民国三十五年4月，经户口调查，全县67乡镇，826保，1068甲，146839户，常住人口672177人。民国三十七年，有户籍146316户，664702口，其中男343139人，女321563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余姚县有户籍672947人，其中男349333人，女323614人。

1953年6月30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计170220户，688718人，其中男357461人，女331257人（或697788人，其中男367133人，女330655人）。因1954年10月余姚、慈溪两县行政区划调整，姚北棉区人口较多的45个乡及浒山、周巷、泗门3个镇划归慈溪县，人口相对较少的陆埠、丈亭、云山等划入余姚县。余姚县由原来的12区145个乡镇，减至126个乡镇。慈溪县由原来的76个乡镇，增加20个乡镇，成为7区96个乡镇，2年后加上庵东盐特区，慈溪县共有103个乡镇，人口也比原慈溪县增加50%以上，成为宁波地区人口最多的县。调整后的余姚人口由1953年的697788人减至1954年的453822人，一下子就减少234896人（或243966人）。

1964年6月30日，第二次人口普查，余姚县为135790户，574783人，其中男298487人，女276296人，比1953年减少123005人。

1982年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余姚全县计218756户，754700人，其中男385037人，女369663人。1987年，余姚市有260280户，788591人，其中男402405人，女386186人。

1990年7月1日，第四次人口普查，余姚市登记总人口794359人，其中男性404476人。

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人口普查，余姚市常住人口852719人，其中男性429835人。

2010年11月1日，第六次人口普查，余姚市常住人口1010659人，其中男性512316人。户籍人口83万余人，寓居人口18万余人，另有外来流动人口30余万人。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余姚市户籍人口83.4万人，其中男性41万人，女性42.4万人。另外有外来流动寓居人口30余万人。